

郭沫若 著

石鼓文研究
詛楚文考釋

郭沫若 著

考古学专刊
甲种第十一号

石鼓文研究 诅楚文考释

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
科学出版社 出版

考古学专刊	甲种第十一号	著者	郭沫若
石鼓文研究	诅楚文考释	编辑者	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
		出版者	科学出版社
		印刷者	中国科学院印刷厂
		经售者	新华书店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一三七号

1982年10月第一版 开本：787×1092 1/16
 198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：21 1/2
 印数：0001—4,000 插页：2

统一书号：9031·1

本社书号：1654·9

定价：8.50元

出版说明

我国传世的石刻文字以石鼓文为最早，稍后有诅楚文，都是东周时期秦的刻石。石鼓至今犹存，但文字颇多剥蚀。诅楚原石不存，原拓亦早湮没，现存最完善的刊本是所谓「元至正中吴刊本」。

石鼓文研究是著者考证石鼓文之文辞和年代的著作。书中发表了明代人安国所藏宋拓「先锋本」，并以安氏「中权」、「后劲」二本为之作「夺字补」。初版本一九三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。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重印。一九五九年著者为第三版写了小引。我社为之校改了个别字，补正了部分附图的比例尺。

诅楚文考释发表于一九四七年，著者考证诅楚文之文辞及其年代，并考订所谓「中吴刊本」的年代及其中三篇诅文的真伪。我社将吴公望氏旧藏之「中吴刊本」补印文末，以便读者参阅，并借使诅楚文之最善刊本得以流传。

郭沫若 著

考古学专刊
甲种第十一号

石鼓文研究 诅楚文考释

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 编辑
科学出版社 出版

出版说明

我国传世的石刻文字以石鼓文为最早，稍后有诅楚文，都是东周时期秦的刻石。石鼓至今犹存，但文字颇多剥蚀。诅楚原石不存，原拓亦早湮没，现存最完善的刊本是所谓「元至正中吴刊本」。

石鼓文研究是著者考证石鼓文之文辞和年代的著作。书中发表了明代人安国所藏宋拓「先锋本」，并以安氏「中权」、「后劲」二本为之作「夺字补」。初版本一九三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。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重印。一九五九年著者为第三版写了小引。我社为之校改了个别字，补正了部分附图的比例尺。

诅楚文考释发表于一九四七年，著者考证诅楚文之文辞及其年代，并考订所谓「中吴刊本」的年代及其中三篇诅文的真伪。我社将吴公望氏旧藏之「中吴刊本」补印文末，以便读者参阅，并借使诅楚文之最善刊本得以流传。

石鼓文研究

增明錫山安氏十鼓金先鋒本
及車權後勁二本諸題跋

一九三六年八月

沫學白署

一九三六年八月 大正十六年

圖書部 總務課 第二本 請照收

掛冊 山史丹十卷 全三冊 本

司總令部

圖書部 總務課 第二本 請照收
一九三六年八月 大正十六年
圖書部 總務課 第二本 請照收
圖書部 總務課 第二本 請照收

三版小引

「石鼓文研究」今改由科学出版社印行，重印并定中有之，亦酌加改正。

一、石鼓运回北京后，已于一九五八年开箱，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箭亭。

二、关于石鼓年代，唐兰曾主秦灵公三年说，近已自行推翻，谓作于秦献公十一年（周显王二年，公元前三七〇年），又推近了四十年。

石鼓文中秦自称公，又有「天子与」，「嗣王始」之语，自当指周王。由此内证及其他根据，故即考定作于秦襄公八年，时周平王元年（前七七〇年）。

唐之新說仍先肯定不致必作于我國年間，但對我所提輯補未加反駁，僅改換上述內証推近年代，按云「烈王二年還不可以稱嗣王」。新說視旧說若有進境，但其自信似仍未堅。

余意，我國亦系周室已同贅痛，對秦誓為有政，政贊等事，在秦視之，當不致受寵辱驚。故余仍維持裏以年說，以待更有力之反証。

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八日

郭沫若

附注：唐氏新說見《故宮博物院》刊一九五八年第一期
唐著《石鼓文年代考》。

重印弁言

明代嘉靖年間（十六世紀）的錫山安國是一位有名的藏書家兼印書家。他有過一部銅鑄的活字，曾經印行過好些古籍。他也喜歡收藏石鼓文拓本。在他的收藏品中，有三種北宋拓本最古，他命名之為先鋒本、中權本、後勁本。三本均經翦裝，年代先後相差不遠。先鋒本最古，後勁本次之，中權本較晚；但中權本殘字多被保存，後勁本之先鋒翦奪最多。故三本雖略有先後，而亦互有優劣。

三本均於抗日戰爭前，被民族文化敗類售往日本，收買者為日本財閥三井銀行的老板，視之為天壤壤寶，秘不示人。

一九三二年秋，我在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看到一套拓本的照片，共四十二張，並無題跋。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後勁本的照片，是三井的兒子借給朋友看，流散在外的。我見到這套照片，曾寫成石鼓文研究一文，收入古代銘刻彙編內，以一九三三年秋在日本印行。我又把照片寄回國內，由馬衡唐蘭二氏負責印出，當時誤信耳食之言，曾以之為「前茅本」。和這套照片的發現約略同時，上海藝苑真賞社把中權本印行，但妄把「權」字磨改為「甲」字，冒充「十鼓齋中甲本」，書後長跋被刪去，以掩其作偽之跡。

一九三六年夏，收藏家劉體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冊，託人送到東京，希望加以利用，進行研究。我選了一五九五片，編成殷契粹編，以一九三七年五月印行於日

本。當我在從事編纂的時候，東京的一位骨董家河井仙郎聽說我處有劉氏甲骨拓本，他便向我建議：願意把他所珍藏的安國三種石鼓文的照片和我交換借閱。河井是三井的學術顧問，事實上就是幫忙三井收買中國古代文物的掮客。安國石鼓文被三井收買時，正是他從中斡旋的，故他藏有三本的全套照片，即是最初進行交易時由上海送去的樣本。這樣本藏在河井處，他也是諱莫如深，祕不示人的。我接受了河井的建議，因而我就有了機會，得以看到先鋒中權後勁三本的全貌。三本照片前題後跋俱全，中權和後勁的蹊蹺也就因而得到了闡明。

河井的照片，我把它複製了。根據這樣難得的資料，我對舊作石鼓文研究進行了一番的修改和補充。整理完

畢之後，我把全部資料郵寄上海沈尹默氏，請他設法印行。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了，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，我結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，回到了祖國的懷抱。這部書的初版是在國難期中，以一九三九年七月作為弘德研究所叢刊之一，由商務印書館印出的。印行以來，不知不覺之間已經經歷了十五年了。人民出版社準備把這部書重印，我趁這個機會把獲得材料的經過寫在這兒。

這部書的印行，主要的目的就在提供有關石鼓文的難得的資料。石鼓存世已經二千七百多年，石經風化，有的已一字不存，存者也十分殘缺。故在今天，我們能夠看到九百多年前歐陽修梅聖俞諸人可能看過的拓本，實在要

算是一件僥倖的事。還有一事值得提起的，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國對日本東京進行大轟炸的時候，上面提到的河井仙郎已被炸死，他的住宅化為灰燼，他所藏的石鼓文照片不用說也會一同被炸燬了。三井所藏的原拓本不知是否安全無恙。如果那一套原拓本也被炸燬，那末這部書的印行要算是把一項文化遺產的遺蛻保存下來了。

石鼓的製作年代，據我的考證，是在秦襄公八年，周平王元年，即公元前七七〇年。唐蘭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石鼓乃秦靈公三年作吳陽上時所作。秦靈公三年為周威烈王四年，公元前四二二年，和我所見相差三百年以上。他的主要根據是文中四字作四，不作三，又屢見避字，即節一人身之吾字，字法均不古。然石鼓文四字均駢之有文，秦

風襄公時詩有駟驥春秋齊靈公時之摩壺銘已有駟字。駟
省爲四而不作三，不足爲異。易經中孚九二「我有好爵吾
與爾靡之」已有吾字。易經成書雖甚晚，然此文辭則採自
民歌，爲時當頗古。吾印乃陰陽對轉，此風飽有苦葉，毛傳
以爲刺衛宣公，詩中三見印字，均作爲我字用。是則吾印
殆古時民間俗語，故於民歌民風中見之。石鼓文作者採
用俗語，故首於貴族詩歌中使用避字。由此可見石鼓中
有避字，並不足證明石鼓之晚，倒反足以證明自我稱吾之
古。爾雅釋詁「印吾台，予朕身甫，余言我也」，以印吾列在第
一二位，亦足見此二字爲古語。且文中稱天子爲嗣王，乃
周王初即位時之稱。秦靈公三年周威烈王己卯即位四年，
殊屬不合。又全詩格調，而詩經中秦風及西周末年之二

雅甚為接近。如大雅車攻吉日諸詩自來以為宣王時詩，無異說。舉以石鼓文相比較，不僅情調風格甚相類似，即遣辭造句亦有雷同。凡此均足以證成我的說法，而於唐說則深相抵觸。

或許有人會懷疑，秦文先由西戎雜處，至襄公時其生產狀況雖離遊牧階段當亦未甚遠。而石鼓諸詩頗為雅馴，表示秦人已有相當高度的文化，何以能夠驟然至此？我看這是容易說明的。這是因為周室東遷之後，有一部分太史作策之類的人員留下了，又做了秦人的官，替秦 襄公司筆札，故爾做出了同西周王朝格調相同的詩。

石鼓文是詩。所敘述的內容主要是貴族階級的畋獵遊樂生活，可惜從詩辭中看不出多少秦人的社會史料。